



民族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興起，是 20 世紀末國際關係領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這股民族主義浪潮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軍備預算的增長、軍事的現代化及在國際事務中自信心的樹立而來。這一新興的民族主義之於國際關係有何意義？又該如何應對它？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1995）相信，除非中國成為民主國家並且被納入世界體系中，否則它將一如 20 世紀 30 年代羽翼漸豐的德國般危險。詹姆斯·庫爾思（James Kurth，1996）亦擔憂，到了 21 世紀上半葉，中國將在軍事和經濟上對美國構成嚴重的威脅，並殃及國際安全和經濟秩序。正如 1866 年後德國的崛起打破了歐洲的平衡，中國經濟在 1978 年後的高速增長及近幾年中國軍備現代化這兩重因素，使得亞洲的商業貿易和勢力均衡岌岌可危。自 20 世紀 90 年代初起，西方出現了“中國威脅論”、“遏制中國”等各式理論。

然而，這些理論的形成只是基於一部分西方人的視角。中國的民族主義真的具有侵略性嗎？它對世界和平尤其是東亞安全構成主要威脅嗎？中國應該被遏制嗎？對於西方的許多人來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正如歷史上的日本和德國等其他主要國家的民族主義，是危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必須加以遏制以維持世界和平的現狀。這些充滿敵意的西方觀點反過來又進一步激化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

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被誤解了。這些誤解無疑促成了中國政府所謂的“反華”理論在西方的出現。事實上，“中國威脅論”、“遏制中國”等“反華”理論在西方相當具有爭議性。雖然不少人認為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正構成潛在威脅，卻也不乏反對此觀點的聲音。許多因素促成了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復興，其中包括中國國內的高速發展及其帶來的中國國際地位的復歸。蘇聯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瓦解，中國經濟卻已成功保持了高速增长。普通中國人的生活隨著國家的發展日新月異。他們為此重拾的強烈民族自豪感，絲毫不亞於 1949 年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一刻中國人所感受到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建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勢在必行。基於此，中國的當政者自然樂見民族主義的復興。若運用得當，它可

以為執政者提供執政合法性的依據。為了避免意識形態缺失所引發的危險，中國領導層時時有意識地求助於民族主義為其保駕護航，這種以中華傳統為底蘊的新型民族主義可以為中華民族的一統提供理論基礎。

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很多人並不這麼看。他們將中國崛起視為對現存國際體系尤其是美國在亞洲利益的挑戰。自蘇聯解體以來，美國將中國視為潛在的勁敵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不少美國人堅持認為，美國須善加利用台灣、香港、西藏、南海、人權、最惠國、世界貿易組織、軍售等各種問題來遏制中國。

“反華”理論的大肆傳播在不少美國人的認知中植入了中國的妖魔化形象。1994 年末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57% 的美國民眾將“中國崛起為世界強國”視為對美國的“嚴重威脅”，比 1990 年 40% 的比例有所增長（John E. Rielly, 1995；引自 *The Economist*, 1997a）。另據 1997 年 8 月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美國人普遍認為中國並不友善，甚至是敵人。^①

在太平洋的另一邊，中國人目睹了美國如何從 20 世紀 80 年代的“朋友”轉變為 90 年代的“敵人”：它向李

^① *The Economist* (1997b: 22) (October 25)。亦見 *The Economist* (1997b: 29-30) (March 29th)。

登輝發放簽證以促進美台關係升溫；它差一點通過了向西藏派駐大使的決議，此項決議一旦通過，就意味著美國承認西藏是獨立國家。中國人看不出最惠國待遇和人權政策之間有任何丁點兒的實質性聯繫，他們所看到的是，美國利用人權政策為其現實政治服務。中國競選 2000 年奧運會主辦國時，美國對中國發難，這一行為惹惱了中國的普通民眾。一名美國觀察家指出：“在過去的 5 年中，很多關注國際局勢的中國人已然從對美國的過度美化中清醒過來，他們意識到美國決心樹中國為敵。”（見 Overholt，1997：5）在此種背景下，在中國知識界，針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民族主義如此盛行，也就不難理解了。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和《妖魔化中國的背後》正反映了這一現象。^①另有一篇文章將美國當下的反華情緒比喻為其 20 世紀 50 年代的麥卡錫主義，這篇文章曾發表在官方英文報紙《中國日報》上。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義情緒在美國院校的中國學者與留學生中也並不鮮見。

誤解和民族主義往往彼此強化，很容易釀成悲劇。照這種情勢，中美之間打一場新的冷戰也並不是毫無可能。事實上，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有不少學者認為另

^① 宋強、張藏藏、喬邊（1996）；李希光、劉康等（1997）。另見何新（1996）；陳鋒等（1996）。

一場冷戰正在迫近。如歐偉倫（William Overholt）所言：

第二次冷戰越來越難以避免。中美間的敵意不僅體現在兩國的國家政策上，也深植於兩國人民的觀念中。中國在美國人眼中充滿危險、尚武好鬥又具有侵略野心，中國人則認為美國想方設法要打壓中國復興。這些偏見顯然遠非事實，卻已在雙方心目中根深蒂固（1997：4）。

對中國政策的恰當解讀，必須建立在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正確理解上。通過細緻審視國人視角下諸多重要的國內外議題，本書試圖探究在中國轉型時期應運而生的新民族主義的本質和它對外部世界的意義。若要依西方所願使中國崛起，進而起到促進國際和平的作用，必須擱置對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舊有的西方解讀，在中國語境下重新解讀中國民族主義。

一、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

西方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誤解根植於其流派繁複的國際

關係理論，這些理論又是根據他們的國際關係經驗而來。在眾多理論流派中，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對西方人理解中國民族主義於國際社會的意義的影響最為顯著。

現實主義將現實簡化，從而使國際地緣政治和勢力結構一目了然。它將大國崛起解釋為結構驅動現象。國家間經濟增長率的差異和國際無政府狀態兩個因素的互動，決定了大國是否會崛起。經濟發展的起伏，使得各大國在時間長河中興衰交替。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提出：“體系中不同國家實力增長的差異導致了權力再分配。”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也指出：“國際事務中主導國的相對實力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主要是因為各個國家間的經濟增長率不同，它們從技術和管理上的突破所沾享的福利也不盡平衡。”相對高的增長率使新的大國崛起，“終有一天它們會在軍事和區域秩序中獲得決定性的話語權”。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崛起中的國家對現狀不滿，因此要求重新劃定勢力範圍。如吉爾平（1981：95）所言，非均衡增長率的意義在於“它改變了重整國際秩序的成本，成本的改變又影響了挑戰舊秩序的動機”。促使大國崛起的另一個因素是國際無政府狀態。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1979）指出，國際體系是一個自助系統，各國須各自照看生存和安全問題。克里斯托弗·萊恩

（Christopher Layne，1993）認為，在國際體系這個角逐場，每個國家都必須致力於增強本國實力以防受到戒懲。

依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中國民族主義的重現歸因於冷戰的結束。冷戰的結束“使得東亞內部之前被抑制的固有矛盾浮出水面”，並形成了“權力真空”的局面。饒義（Denny Roy）對“權力真空”做出如下定義：

隨著往昔的霸權國漸漸失勢，區域內至少有一個曾受其牽制的國家開始試圖擴張勢力……權力真空意味著新的霸主將崛起以取代沒落霸主。新的霸主或許不如鼎盛時期的沒落霸主，但足以傲視區域內的其他任何國家（1995）。

中國的現代化和經濟的高速增長催生了新民族主義，也很可能使中國有能力來填補這種權力真空。有學者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將改變東亞的權力分配，對區域安全構成重大威脅。饒義認為：

中國從一個發展中的弱國成長為一個繁榮的強國，勢必要推行更為強硬的外交政策……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得中國更有能力控制其周邊環境，同時又使這種控制的成本

降低。富起來的中國將以大國姿態在區域立足：中國會更大膽地爭取利益，也會對與區域內其他主要國家合作有所保留（1994）。

此外，還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加劇了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對世界和平構成的威脅。早前，外交史家如費正清（John Fairbank，1968）曾指出，“天朝綜合徵”影響著中國的現代外交政策。老一代中外學者一致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與現實主義相悖，它對戰爭和暴力的理解與其他文化有著天壤之別。儒家傳統愛好和平。中國人鄙棄直接施加暴力而看重計謀、策略和其他心理戰術，這就是孫子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但對國外新一代學者來說，傳統中國對於武力的理念正好與西方的“現實主義”相洽。基於對中國古代兵法典籍和明朝歷史（1368—1644）的研究，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1995）提出，中國的現實主義並不是一般所認為的簡單的實用主義和權宜之計，而是體現了中華文化本身。這是一種極端現實主義的戰略文化，這種文化“將動用武力視為消除安全隱患的最有效手段”。因為中國的現實政治行為根植於這一戰略文化中，推動中國使用武力來解決安全問題的“不是無政府國際結構所產生的自衛動機，而正是這一戰略文

化”（Johnston，1995）。戰爭被認為是國際關係中相對恆常的要素，與對手的衝突是一種零和博弈，而純暴力則是最有效的解決敵人潛在威脅的手段。

自由主義者認為民主國家間不會發生戰爭。那些由自己的公民來選擇領袖的國家更傾向於和平共處。無論在貿易還是外交上，它們都是更可靠的合作夥伴。相反，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威權政體則很可能成為世界和平的重要威脅。歐洲的和平正是由於大多數歐洲國家是穩定的民主國家，社會和經濟分層現象相對不嚴重，亞洲的情況則並非如此。首先，財富和收入分配均衡的穩定的民主國家在亞洲少之又少。其次，亞洲的政體類型也更為多樣化，包括朝鮮的斯大林體制，東南亞的現代民主與傳統威權並存的體制，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自由民主制，以及中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自由主義者也相信國際組織可以促進國際合作，降低某些國家單方面發起軍事行動的可能性。然而，亞洲國家間的經濟依賴關係不如歐洲國家間那麼密切，也很少有強大的區域組織為泛亞合作提供平台或牽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的崛起。

更重要的是，中國無意加入多邊安全協議，這是因為：

中國人相信任何關係都不是長久的，因此保持獨立和使自由度最大化尤其重要。聯盟和約束性承諾限制行動自由、妨礙獨立，因此須加以避免……此外，結盟國通常是不可信的，它們打著自己的算盤，操縱中國以滿足一己之利，而這往往使中國陷入與這些國家的敵對國的爭端中（Shambaugh，1994：45）。

該如何對付中國？現實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都主張設計一個宏觀戰略以應對中國的崛起。然而，由於兩派對“中國威脅”的看法存在差異，他們所設計的戰略也不盡相同。現實主義者主張抑制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牽制其國家實力的發展。他們的觀點體現在“遏制中國”的討論上。他們力爭通過控制貿易和技術輸出等手段從經濟上孤立中國，遏制其發展，以符合美國和其他亞太國家的利益。

柯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1995：72）提議，瓦解中國應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美國應在“公眾場域”繼續敦促中國尊重和重視人權。美國傳統基金會根據中國在人權、安全和經濟等一系列方面的表現，將其判定為“藐視國際行為規範”的無賴國家，並建議“美國必

須使北京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表現為整個國際社會所不容”。

《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1995）言稱，遏制中國“並不是要讓西方國家像曾對待過蘇聯的那樣，用核武器將中國大陸包圍”，而應該形成統一戰線“漸進地……與台灣加強聯繫”。現實主義派別還提議，西方可以通過鼓動中國的地方主義來削弱其中央政權，並策劃一套旨在更大程度上承認中國各省和地區的行政自主權為基礎的經濟接觸，以使地方上對其自主地位和與外界交往的能力更為自信。

傑拉爾德·西格爾（Gerald Segal）還提出，遏制中國的最好辦法是使其融入國際體系，因為“中國融入國際社會越深入，它的憤懣情緒就越有可能得到疏解，它使用武力來解決爭端的可能性也會降低”。

不同於現實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則堅信，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文化進步最終會使中國走向民主化。美國副國務卿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1996：57）基於其他東亞國家的政治發展經驗總結道：“從長期來看，經濟發展和政治專制必定是不相容的，特別是在被通信和貿易密切聯繫起來的當今世界。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視野的拓展，他們對政治參與權和法治的要求會更為迫切。”美

國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在他第二屆任期的第一場新聞發佈會上也指出，隨著外界信息的湧入，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將共同推動自由精神的發揚。中國無法逆民主潮流而行，正像柏林牆終究還是要倒塌一樣。基於這一關於自由精神的假設，美國提出了將中國納入現有世界體系的接觸戰略。然而，這種接觸是有條件的，中國必須首先接受現有國際規範和機制，西方國家才會考慮接納它。

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都沒有抓住中國新民族主義的本質。他們對中國新民族主義和其對國際政治的影響的誤解只會使它火上澆油。同時，在民族主義情緒的驅動下，中國人也時常誤解美國的對華政策。確實，西方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誤解很有可能成為它走向激進化的主要因素。

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 Said）在他的《東方學》（*Orientalism*）中討論了當西方學者試圖探究非西方文化時，是如何產生誤解的。在薩義德看來，現實和被呈現的現實之間並無簡單的一一對應關係。這是因為：“所有呈現，正因為它們僅僅是一種呈現，都首先植根於表述者的語言中，其次又受表述者所處的文化、制度和政治環境的影響。”同樣，保羅·柯文（Paul Cohen）也認為：“對於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晚清以來的這段中國史的美國

學生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種族中心主義的偏見。”確實，薩義德在中國知識界頗具威望，他的東方學也成了中國知識分子建構抵制西方的民族主義話語的理論武器。但這並不意味著必須依循薩義德的理論來闡析本土觀念中的中國民族主義。在闡釋異域文化時，種族中心主義所帶來的偏見固然不可避免，但將這種偏見最小化卻是可行的。柯文（Cohen，1984）指出，以中國為中心的方法的最主要特點是，“它立足於源自中國的中國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受到西方的影響，也可能正是由西方所造成。抑或，這些問題不管是從其所處的場域和影響的人群，還是衡量其歷史重要性的尺度兩個層面來看，都是中國本土的而非西方的”。

柯文進一步闡釋了中國中心法的四個特點：

- 它的中國歷史始於中國而非西方，並以本土的（中國的）而非外來的（西方的）標準來評判歷史事件的歷史意義。
- 它將中國“水平地”劃分為區域、省、地級市、縣和鄉，由此產生了區域史和地方誌。
- 它也將中國社會“垂直地”分層，促進了民間和非民間的關於較低階層的歷史書寫。
- 它將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技術引入史學，為

歷史分析所用（Cohen，1984）。

以中國視角來理解中國新民族主義，要求在中國發現中國民族主義並“挖掘”出它的內在動因，這是西方視角所無法做到的。同時，這也要求通過分析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它的變與不變，為何變以及如何變來識別它的要義。但這並不意味著各種西方視角對於理解中國新民族主義沒有助益。而是說，不能用它們來“建構”或想象中國民族主義。因此，我的研究可以說是要破除這種“建構”，展現本土視域裏的中國民族主義。

二、國家認同與對外行為

國家認同如何與中國的對外行為發生聯繫呢？近期關於國際事務尤其是國家安全的文獻，超越了傳統的權力和國家利益視域，將目光投向文化和身份認同這些社會學的分析因素。這些研究證明了文化對國家內外行為具有重要影響。人們根據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稱之為習慣、技能和風格的“工具箱”來建構行動策略，文化規範

和身份認同因此而得以影響個體行為。換句話說，規範通過給行為提供組織形式而非限定行為本身來塑造行為。它們根據經驗來創造解讀習慣和行動指令。此外，重要的不僅是政治行為人對於塑造他們的興趣和行為的社會規範的依從性，也包括行為人（再）闡釋他們的身份並據此（再）定義他們的興趣和行為的能動性。

民族主義是一種集體認同。可以從多種角度來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心理或“觀念”基礎——國家認同——及其對中國的國際關係或對外決策的影響。長久以來，文化、觀念、身份認同和個體認知對於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馬克·曼考爾（Mark Mancall，1984：xvii）寫道：“那些根據指導他們日常生活的世界觀來定義這個世界和他們自己的人，制定和施行了政策。外交決策者的理性假設、感性偏好、認知地圖和知識結構都基於流行於他所處的社會的世界觀。”饒濟凡（Gilbert Rozman）、艾倫·懷廷（Allen S. Whiting）和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著作研究了精英階層對於某國的觀念如何影響了中國對此國的外交政策。

例如，為了研究中國對日政策的變遷，懷廷鎖定中國精英階層和普通大眾，發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日本印象。正面印象將日本視為中國現代化應該效仿的對象，反面印